

# 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述论

——基于《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的考察

贾 凯

**【摘要】**“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特色和创新。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一个群体，“学共产主义”是其内部训练、开展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方式，主要通过内部通信及传阅通信集来开展。“学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哲学疑难问题，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法西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中国革命现实问题，个人与“学共产主义”关系等方面。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经验是处理好三对关系：“学共产主义”与“洗涤脑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个人与团体的关系。

**【关键词】**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阶级

**【作者简介】**贾凯，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18.6.93～1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710030）。

“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优势，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情况下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主要侧重思想建党的理论、规律及其历史脉络的梳理，对于一些问题的探讨还不充分，如中国共产党早期如何认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除在理论、原则上重视“共产主义教育”<sup>①</sup>之外，在实践中如何“洗涤脑筋”“净化思想”？在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之外，如何清除“非共产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学术界对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教育”的丰富研究相比，学者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主义教育”的关注较少，更缺乏微观、专题性探讨。

中共旅欧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起组织

之一，其成员绝大多数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曾经受到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那么中共旅欧支部如何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呢？其途径是“学共产主义”，设立共产主义研究会、训练部等机构，通过内部通信来研究与讨论“共产主义”。梳理、分析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问题，有助于认识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的关注较少<sup>②</sup>，本文拟通过对稀见《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以下简称《通信集》）的梳理、分析，就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1922年初，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熊雄、张伯简等在德国成立了中共旅德小组。1922年6月，按照组织规定，赵世炎任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

员和留法组组长。<sup>③</sup>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它是属于青年团性质组织。党、团组织合在一起活动:党组织秘密活动,一般以团的名义开展活动。1922年底,旅居法国、德国的中共党员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2月,旅欧“少共”改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设置了共产主义研究会、训练部等机构,通过成员通信、传阅通信集加强内部教育。中共旅欧支部自成立之日起,为实现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提出的“共产主义教育”任务,加强内部训练与研究,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派、基督教青年会等组织,提出了“学共产主义”“洗涤脑筋”等目标,《通信集》正是对中共旅欧支部当时状况的具体反映。据现存4期《通信集》来看,几乎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学共产主义”活动,研究、讨论的问题有:哲学疑难问题、经济学基本理论、法西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中国革命现实问题、个人与“学共产主义”关系等方面。

### 一、关于哲学疑难问题的论辩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旧哲学的革命,包括本体论、辩证法、必然性与规律性等各方面。中共留法群体通过阅读中、法、德文尤其是法文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以及《人道报》《共产国际》《国际通讯》等报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基本掌握,如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问题、必然性与规律性问题、人类进化问题等。五四早期实验主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对于青年影响很大,甚至会他们在他们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造成思想困惑,如有人认为经济组织、社会制度可以用革命公式解决,人生问题、心理等现象只能“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sup>④</sup>,这也是张君勱“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观点的反映。总体来看,中共旅欧支部主要关注人性问题、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问题、人生观问题等。

其一,对于哲学主要问题的科学认识。《通信集》第7号所收录的熊锐的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

几个重要点”进行了系统归纳,这封信的缘由是熊锐希望与高真、绍群、子君、永璧、肇绪<sup>⑤</sup>讨论这些问题。

首先,关于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问题。熊锐指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科学都随着时代、阶级而诞生、变化,这个时代、阶级所需要的文化、科学与别的时代或别的阶级的不同,不同时代、阶级的文化、科学的“质”和“量”都不同。<sup>⑥</sup>即文化、科学都是属于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的,不是永恒的、超阶级的。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有自己阶级的社会学,如孔德、涂尔干的学说;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则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论或称之为“经济的唯物论”。同样是马克思的学说,工人阶级的苏俄将其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学”或“共产革命的基本科学”,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只会对其做“断章摘句的曲解”,这说明同样的东西对于不同阶级而言,其效用、性质也会不同,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的阶级性。

其次,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刘伯庄认为:“物质要在人心中经过变化,才能成思想,则物质也不过思想的一种材料。”任卓宣则批评说:思想要根据外在物质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思想不过是物质的反映罢了,它反映的是物质在人心中的映像、颤动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将个人思想置于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的,而不是“空中落下来”的。<sup>⑦</sup>显然,任卓宣与刘伯庄讨论的是“什么是第一性”问题。

再次,坚持运动、联系等辩证法基本观点。熊锐指出:研究每个社会,要探究其本质和表象;懂得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一个社会变成另一个社会,不像“圆”突然变成“方”,而是要在“圆”的社会中经过不断运动为“方”的社会准备充分条件,这样“方”的社会才能由“圆”的社会突变而成;坚持普遍联系、结果与原因相统一的观点,把每个社会的发生、发展与其他社会联系起来共同考察,懂得社会的历史与现在的关系、事物变化的条件和原因,

由此便能明白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必然性。

最后,强调马克思主义属于“有定论”而不是“无定论”,坚持规律性和必然性。熊锐指出:社会现象有其法则,人的主观性要服从某些法则;社会现象是由人的行为形成的,且有其内在法则,因此人的愿望不能绝对自由而无所依赖。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宿命论,与宿命论有根本区别:历史必然律认为事物永远是动的、历史的,事物的发展有其原因;宿命论认为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且不去探究事物发展的原因。<sup>⑧</sup>总之,中共旅欧支部接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但对于某些问题的论述逻辑性不强,认识也不够科学,如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原因论而不是目的论的论述就比较混乱。

其二,关于某些哲学问题的认识误区及相互辩论。

首先,关于人性问题的激烈讨论。人性问题是不同哲学派别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是中共旅欧支部内部争辩的热点。蔡支华指出:剥削之所以产生,少不了人的狡猾性、懒惰性的作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消除。尹宽批评说:性善说、性恶说都是错误的,因为人的意识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监视,免不了偷懒和“堕落”,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人懂得劳动是大家共同的事,人人都劳动,“好逸恶劳”这一点已完全改变,每个人都热爱社会,犹如家庭成员都热爱家庭、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爱自己、国家主义者爱戴国家。<sup>⑨</sup>针对蔡支华、尹宽关于人性狡猾、懒惰的争论,任卓宣指出:根据蔡支华的观点,很容易得出人性恶的结论,但是人性如同白板并无善恶之别,所谓“狡猾性”“怠惰性”不过是环境的产物,受产业、经济组织的影响而变化<sup>⑩</sup>;凭主观见解说的话并无根据,也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态度。综观《通信集》第2、3号来看,人性善恶问题是当时很多青年的困惑,甚至前几

期都在围绕这一问题讨论。

其次,道德及无产阶级道德问题也是争论焦点,俊哲、大材<sup>⑪</sup>、任卓宣、肖朴生在《通信集》第6、10号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大材指出:凡是二人以上群众都要适应当时的道德,任何时代都有其特定道德,这是“千年万古的真理、一成不变的定律”<sup>⑫</sup>。肖朴生批评大材说:道德虽然随时代变迁,但不是永恒的,如原始社会就没有道德;道德是历史的产物,没有永远的标准;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生产发展的产物,不是道德的产物。同时指出: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共产社会没有阶级,也就没有政治,法律、道德也必然不能存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人互助,每个人为社会劳动、受社会供养;人与人之间是平等而不是对立的关系,不存在道德与不道德之分,也就没有道德了。因此,道德在共产主义社会会随着政治、法律等一起消灭,否则就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最后,提出人生观问题,请内部同志讨论、批评。任卓宣在《通信集》第10号中提出“人生观”问题,希望同志们认真讨论。据其所说是受熊锐在《宇宙与人生》中观点的启发。任卓宣认为人生观问题要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要“站在社会内解决”,而不是在头脑中讨论,并指出人有三种属性:首先人是生物,有发展生活的需要,即人有生物性;其次人是具体社会中的人,人生观由每个社会的生活条件决定;再次原始社会以来的人,都属于某一个阶级,因此人生观具有阶级性。由以上三点可以推出无产阶级的人生观:首先要参加劳动,不参加劳动便不能生活;其次要开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不进行斗争便不能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只有通过阶级斗争、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无产阶级真正过上人的生活。针对“人是专为吃饭的么?”的反问,任卓宣批评说:人是生物,不为了生活,那是为了什么?既然生物都要生长、生活和生存,那么人还不愿意生活、生存吗?谋发展、生活、生存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生活目的。

针对“超物质的精神生活”、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太粗浅”观点,任卓宣批评说这是看不到思想观念由生活条件决定这一根本点,离开生活实际去谈论问题、研究问题,便什么结果都得不到。<sup>③</sup>基于这些分析,任卓宣强调说:我们应该摆脱虚荣的观念,去做实际的斗争;除掉个人主义思想,去做团体的斗争,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任卓宣对于人生观的分析既注重内在逻辑的严谨性,又对错误人生观进行揭露,可谓正、反论证相结合。

## 二、从剩余价值理论到资本帝国主义:关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讨论

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时各种思潮对于他们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包括不可知论、无政府主义人生观等多个方面,从《通信集》相关内容的认识和争论也能看出这一点。与之相对应,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学共产主义”过程中,对于经济学理论问题的探讨,还处于理论的入门阶段;相关讨论也能反映他们当时的兴趣所在,以及困惑之处。

第一,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条件问题。任卓宣在通信中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是因为他运用唯物史观考察经济现象。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客观条件、物质基础,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被剥削者就能感受到自身的痛苦,历代学者达人也能观察到剥削所造成的社会惨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使剥削、压迫更为明显,英、法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马克思原本是资产阶级的子弟,随着被资产阶级政府驱逐,马克思也成为无产者,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往来则增加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使其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两大条件的具备促使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任卓宣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剩余价

值理论是基于以上两个条件诞生。这一认识并不科学,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对于前人思想学说的扬弃。

第二,关于共产主义是否实行工钱制问题。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一般不太科学,如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提到“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sup>④</sup>。蔡支华在给尹宽的信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实行工钱制”观点,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将金钱制度作为一种限制手段,因为无论教育普及到何种程度、知识充分到何种程度、道德高尚到何种程度,人们都会有好逸恶劳的心理。<sup>⑤</sup>张增益说:人的本性是不愿意劳动的,所以工钱制有存在的必要。尹宽对于这些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首先,工钱是市场上作为流通工具的钱币,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交易也就没有了钱币,人的劳力失去了商品性质,因此不需要工钱。其次,“好逸恶劳”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无产阶级在与资本家斗争的过程中渐渐有了阶级觉悟,并处处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待将来推倒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国家后,就会拥护自己阶级的国家<sup>⑥</sup>,还会努力为社会做贡献,“好逸恶劳”现象必然消失了。从中能够看出,他们对于工钱制的分析是基于经济发展、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得出的。

第三,关于资本性质的讨论。共产主义研究会按照地域不同分成若干组,其中 Clition、Billancant 和 Montagis 三组围绕资本的性质进行了研讨。首先,驳斥了亚当·斯密、罗西等学者的“生利之物都是资本”观点,指出按照这样的逻辑,古代人打鸟、杀兽的工具是资本,未来人们丰衣足食的生产机关也是资本,资本变成永恒、天经地义的了。其次,指出分析资本要基于社会关系、在运动中加以研究。资本不是死的、固定不变的事物,原是一种财产形式,只是在特种条件下才变成资本;资本是一种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历

史性的生产关系。再次,要区分资本与资产。财产只有变成运动的价值时,才会变成资本;资本、资产都是财产,但不能说财产就是资本。最后,资本不是货币,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物,能够表示商品价值,因此有货币就有了生产方法,同时呈现出资本这一特殊形式。<sup>⑦</sup>这些关于资本性质的内部讨论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主要解答内部同志在资本性质问题上的困惑。

第四,关于资本帝国主义本质引发的讨论。赵光宸把《共产主义入门》第四章中最后一段译出寄给尹宽,尹宽将其命名为“何为资本帝国主义?”收入《通信集》第5号。尹宽认为赵光宸按照英文文本翻译的错误很多,任卓宣遂将均锐按照德文文本翻译的寄去,作为内部讨论的材料。均锐的译文指出:使财政资本能够为资本寻觅市场、原料、产地、输出地的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财政资本的产物,托拉司这种帝国主义形式掠夺全世界、建立资本帝国主义,只有战胜国的垄断资本家具有“统辖全权”,比如英国帝国主义所做的“统辖全世界”的美梦。这段译文分析了财政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并指出了托拉司这种统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性质,帝国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战争。“供全世界压服于战胜国的财政资本之下的,这样的战争,便是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sup>⑧</sup>。这段文字是一段译文,对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介绍过于简单、论证也不充分,也有翻译不恰当之处。他们当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只能将英译本、德译本作为对比学习的材料,这也是当时共产主义研究会的困境所在。

### 三、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基于唯物史观、辩证法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必然性,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为人们分析世界局势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中共旅欧支部针对法

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等四个方面内容,进行了讨论。

第一,关于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1922年10月,意大利国家社会党攫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统治以后,中共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对此十分困惑。首先,傅钟向尹宽提出疑问:最近很少看法文报纸,他们所报道的法西斯主义究竟是什么主义?尹宽回信说:这个运动是反工人阶级的运动,帮助大工业资本家、大地主阶级恢复他们的经济势力,统治无产阶级、破坏工人集会和工人组织,对社会其他阶级实行独裁统治,因此fascist是资产阶级拯救其反动、非法统治的一种新表现。<sup>⑨</sup>其次,“国家社会主义”用语错误的问题。张增益在《通信集》第1号中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还要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其思想渊源是陈独秀《造国论》:“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任卓宣指出这个用语有些不妥,因为:共产主义不能叫国家共产主义,如果社会主义指共产主义,那么就不能用国家社会主义代替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变形”,与共产主义本质上相反;蔡和森、张增益等人所提到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革命中的“过渡期”,可以称之为新经济政策或国家资本主义。这也反映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用法的不正确或混乱。

第二,关于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张申府、傅钟、尹宽、任卓宣思考俄国革命问题时提出了“列宁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疑问。张申府在共产主义研究会巴黎组开会时发言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俄国实行,是因为俄国革命和列宁的主张都不在马克思理论所能推理的范围。傅钟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革命也无法遵循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来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但是仍然没有超出马克思学理、公式的范围;列宁只是马克思主

义兴起时的阐明者、实践者,他的理论主张并不能另外独立为一种主义。几天后,傅钟又写信给尹宽说:张申府的思想似乎有违背共产主义的迹象,肖朴生不加斟酌和修改就将他的文章发表在《工人旬报》十分错误。<sup>⑩</sup>此后,任卓宣对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进行表态,指出:列宁的学说可以称之为“主义”,因为从列宁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及其分析、运用来看,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列宁主义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围的,他的重点在于解释、阐明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使共产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而列宁是将共产主义由科学理论转化为现实行动。<sup>⑪</sup>也就是说,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旅欧支部创始人的张申府,在当时引起中共旅欧支部很多人的批评,甚至决议开除他,只是后来被中共中央阻止而不了了之。

第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过渡期、条件和原则问题。首先,针对任卓宣论述国家社会主义时提到的过渡期问题,尹宽在给方圆的信中说: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形态会随各地、各时情形之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会有一个过渡期,如俄国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作用是使生产、分配的管理更为合理,使工业、农业集体化,使教育社会化,在此基础上便进入共产主义了。<sup>⑫</sup>其次,李蔚农论证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打破私有制,使生产关系符合全社会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推论,资本主义制度使一切生产关系由个人的、家庭的变为社会的,但是生产却不是为了全社会需要,而是为了商业银行;生产、分配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定期出现的经济危机;社会中一部分人——资产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另一部分人——无产阶级——如奴隶般困苦,这便造成了两大阶级的明争暗斗——阶级斗争,其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崩坏”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sup>⑬</sup>最

后,沈沛霖的某位朋友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条件:一是物质财富能够供全世界的人的需要,二是全社会成员普遍了解共产主义,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俊哲致信沈沛霖说:这两个条件是对的且是必需的,缺一不可,但是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达到满足全世界需要的程度,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自发产生共产主义觉悟。可行途径只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进化与革命的原则”,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无产阶级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根据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原则联合起来,从事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使无产阶级成为支配阶级,将一切生产机关、教育机关社会化,实行根据社会需要开展生产的计划经济,在全社会普及社会主义教育,这才标志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sup>⑭</sup>这些通信和讨论表明,他们意识到通往共产主义,除了无产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这条路,别无他法。

第四,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问题。中共旅欧支部内部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细节进行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地讨论。方圆构想了理想社会:阶级消灭,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房同住,有工同做,有书同读,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sup>⑮</sup>尹宽回应说:共产主义社会不会出现“不尽所能、专取所需”的情况,而是这样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才能选择工种,生产变成集体共同的活动,产品分配是全社会平均分配、各取所需。<sup>⑯</sup>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实现了各取所需,还能使每个人自由发展个性。与之相随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分工问题、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关系问题。尹宽在回应蔡支华“共产主义社会如何保证劳动、分配的绝对平等”时,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心者”“劳力者”之间只是技能的差别,并不会因此产生社会地位的差距,这种差别只取决于人们的才能、个性、兴趣,不涉及社会产

品的分配。

#### 四、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如何推动中国革命的讨论

中共旅欧支部机关报《少年》《赤光》属于公开、半公开性质，强调对外宣传；《通信集》是对中共旅欧支部成员之间通信、讨论的汇总，强调同志间的讨论与争辩。根据《通信集》内容来看，中共旅欧支部更为关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其中主要涉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如何开展、怎么做军阀工作、中国如何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工人阶级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等。这些内容体现出中共旅欧支部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相关问题。共产主义研究会北方组成员发表的《军队运动问题》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派军阀打倒别的军阀、一群政客推翻别的政客，只是权力斗争，不是平民革命。任卓宣批评说：辛亥革命是有产阶级领导、发动的革命，是有产阶级革贵族阶级的命，是海内外有产阶级战胜了有产阶级立宪派的结果。<sup>②</sup>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军阀、政客不仅是“当官的”，还有其阶级属性：军阀是封建时代保护贵族阶级的东西，民主革命时期他们仍保有武装，因此对于有产阶级而言，他们不得不依靠军阀保护其阶级利益，而军阀们又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以维持他们的存在。<sup>③</sup>基于对辛亥革命的分析，他们得出一般性结论：中国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打倒军阀既是统一战线需要，又是阶级斗争的需要。

第二，中国革命如何开展及其焦点问题。搞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有助于探讨中国革命的开展问题，即“中国革命底计划”。中共旅欧支部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如何对待军阀”在中共旅欧支部内部意见不一致，最终通过讨论才形成了共识。任卓宣批评张增益说：对于你所说的革命方法，我有不同意的地方，其中联络胡匪即是一例，国民党的革命就是深受其害，国民党

本身都差不多胡匪化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要接受这一教训，不可重蹈覆辙。<sup>④</sup>方圆则提出三点意见：做军官工作，使其信仰我们的主义、加入我们的团体，如冯玉祥即是成功例子；我们的同志加入军队担任军官，并在军校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做军队工作，使其受我们指挥。<sup>⑤</sup>这三点意见也基本符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国民军的工作思路。其二，关于民主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李蔚农在给尹宽的信中指出：打倒军阀是中国任何革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中国不能立即实行共产主义革命，而要先扶助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较为进步，能够号召全体国民合力打倒军阀、实现国家独立，但是这一革命是第三阶级的，与第四阶级无关。<sup>⑥</sup>尹宽对于李蔚农先进行民主革命、后实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观点表示认同，但是批评“第四阶级与民主革命莫有大干系”观点，指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展民主主义革命不是白白为第三阶级帮忙，而是能够谋取自身解放的直接利益，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现在所求之解放并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这些是无产阶级自身的、直接的利益，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步；一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就要与第三阶级对抗，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sup>⑦</sup>他们讨论的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否要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也间接提到了要不要争取革命领导权问题，对于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关系等相关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三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

#### 五、关于个人与“学共产主义”关系问题的争论

中共旅欧支部关于“学共产主义”有诸多争论，就以上内容来看分歧不可谓不小，这些基本可以算作团体问题。实际上，这些原本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在求学与学共产主义关系、要不要家庭、《少年》文艺栏内容是否必须关乎主义等问题上也有分歧，归根到底还是个人与团体的关系问题。

从中共旅欧支部成员的命运和团体活动来看,这些问题主要是由成员个性差异造成的,但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如1923年6月中共三大即要求“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sup>③</sup>。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旅欧支部的内部讨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要不要入学、要不要学习自然科学,以及与学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共旅欧支部内部争论的最大焦点之一,其分歧根源是留法勤工俭学是否可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是否行得通。张增益说:除了研究主义以外,还应该研究军事、政治、农业、工业、外交、财政、权力、分配、银行等问题,不能只学习机械知识做工程师。<sup>④</sup>任卓宣指出:学习科学、工艺固然有用,但是只是个人工具;而共产主义革命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中国革命需要大量人才,我们应该“促短”中国革命,直接学习革命“所用的工具”;学习科学、工艺需要金钱支持,且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好,如果学不好,那么金钱、精力都浪费了;不论作工还是进学校,同志们宜尽早决定,然后去接受训练,“把东方人的脑筋大加洗涤”;学习一切群众工作的技能,并与群众真正接近。任卓宣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不论作工还是进学校,都要“学共产主义”。尹宽指出这一问题刻不容缓,有某种学问基础且有经济支持的同志,应该继续完成学业,同时还要研究共产主义,否则便是违反组织规定;对于某种“实业”学过一点但经费没有保障的,要放弃学业而不要有所留恋。<sup>⑤</sup>李蔚农指出两点:一是团体内同志可以专门学习工艺,但是不能放弃团体训练和研究共产主义;二是所有团体同志都要“练习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参加国际活动,观察各国劳动运动情形。<sup>⑥</sup>很显然,中共旅欧支部内部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读书,而是在学习共产主义的同时要不要学习科学、工艺,并强调语言学习对于同志的重要性。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有不足,如只看到科

学、工艺对于资产阶级剥削、杀人的作用,认为学者、工程师、科学家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奴隶<sup>⑦</sup>,没有看到科学、技术也有非意识形态的一面。

第二,对于团体训练和理论研究的反思。共产主义研究会内部的研究、训练活动也存在诸多不足,他们内部也有反思。如他们认为与中共旅莫支部“能以团体的真训练”的同志相比,“我们西欧的同志太缺团体的训练了”,假如我们到工人群众中去活动,我们肯定不具备组织活动、指挥群众、语言表达等各方面的能力,因此每礼拜必须练习讲演,且以自己的读书心得为题目。<sup>⑧</sup>以内部讲演活动为例,有同志反思讲演活动存在诸多不足:讲演者自身研究不足或讲演时发挥不好,讲演者因事情较多而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讲演时间过短,不足以使听者消化吸收;参加者不能按时到会或不能系统参加者众多;因时间不足,缺乏充分的讨论、质疑,同志忙于工作或功课不能提早预习;新加入同志对于共产主义研究较少,各支部讨论会取消后各同志研究主义的机会更少。总之,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研究会内部成员的讨论无法充分展开,也没有时间进行系统、充分地理论研读,影响了内部讨论的质量。根据1925年中共四大《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党中政治教育做得很少。在党报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教育党员关于党的政策的讨论问题,在小组会中很少有政治报告”<sup>⑨</sup>的批评来看,中共旅欧支部的工作已属十分出色。

第三,个人情感、思想与“学共产主义”、团体工作的关系问题。中共旅欧支部部分人对于个人与团体关系的认识较为“机械”,如有同志认为:我们要以革命为职业,一切家庭关系都会影响我们的革命事业,一个不舍得家庭的人如何能做革命事业?<sup>⑩</sup>出版委员会对于机关报《少年》文艺栏(H项)所载内容是否专载主义性质作品的广泛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

范严认为:H项应该扩大登载范围,不必专载

主义性质作品,因为“专载莫多大意思”,我们翻译的内容也未必好。奇岳完全赞成范严的观点。刘伯坚认为:H项若能专载主义作品更好,但是所能找到的作品有限,我们的创作能力也有限,因此作品可以不带共产主义性质,但是不能违反共产主义。周维桢部分赞同范严主张,认为:主义不一定要鲜明,但是要体现“平民化”色彩。

人达反对说:不关乎主义的作品,可以在别的地方发表。李富春说:我完全不赞成范严的提案,带有主义性质的作品我们还没有登载,哪能登载不相关的作品;将H项登载范围扩大,登载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没有意义,我也不赞成这样做。重如说:重点是要扩大共产主义宣传范围,国内很多东西能够寄来,足以登载供我们学习,我们何必登载不相关作品?赵光宸、行候则指出:《少年》是我们的机关报、唯一宣传主义的杂志,登载其他作品会消磨革命意志,也不利于对外宣传。尹宽写信也表示反对:一是共产主义者是革命者,终身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牺牲,哪里还有其他意志和感情,其他作品无非是无病呻吟;二是《少年》是对外宣传的刊物,所载作品必须带有主义性质;三是材料缺乏对于《少年》这一不定期杂志来说,不是问题,内容可多可少,不必凑篇幅。<sup>④</sup>从这些反对意见能够看出,中共旅欧支部大部分人认为共产主义者要为无产阶级奋斗终身,要排除其他主义的影响,不能无病呻吟。显然,大部分人认识到共产主义者除了团体事业别无他求,应该消除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这也是“学共产主义”的初衷。

## 六、结语

西欧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留法勤工俭学生普遍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这些因素使得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一个群体。实际情况比这一基本论断要更为复杂:留法勤工俭学生大多受到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曾琦、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又将共产党人看作最大敌人,比利时雷鸣远神

父又拉拢勤工俭学生信仰天主教<sup>⑤</sup>,这些都表现在《少年》《赤光》的对外思想斗争文章中;共产主义研究会内部的《通讯集》更能反映中共旅欧支部成员的理论水平,他们针对团体成员思想的谬误、困惑进行讨论、批评,围绕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个人与“学共产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辩论,体现出他们在“学共产主义”“洗涤脑筋”方面的真诚。“学共产主义”的具体目的十分明确——思想“无产阶级化”。据担任过中共旅欧支部、旅莫支部负责人的任卓宣自述:“学生都是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他们放弃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色彩而无产阶级化。这就是说,在思想、言论、行为、态度上都要从原样改变过来。”<sup>⑥</sup>

通过对《通信集》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中共旅欧支部在“学共产主义”“洗涤脑筋”方面有一些特点:一是按照“努力学习,从早回国”<sup>⑦</sup>的要求,围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焦点问题进行研讨,体现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积极思考;二是内部研讨、辩论主要围绕团体成员关心的理论、革命问题,且聚焦成员思想困惑、马克思主义与其它主义的区别,而不是围绕理论、文本进行学院式的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成员外语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是救亡图存、中国革命的紧迫性使然;三是力图处理好个人与团体关系的张力和限界,《通信集》反映出内部成员在学科学工艺与学共产主义、思想要不要专属主义等问题的分歧和争论,这一方面反映出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想仍有影响,另一方面体现出中共旅欧支部内部在个人要不要毫无保留地献身共产主义事业问题上的分歧。总之,《通信集》反映出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学共产主义”的内容和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建党初期较为普遍的情况,体现出五四青年转向共产主义过程中的某些规律。

随着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对党员数量发展的

强调,党内教育、“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性则相对减弱。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批评说:“社会上一切革命分子,只有加入我们的党后,才有受到党的训练及真能了解党的理论之机会,我们决不可妄想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得到许多现成的党员……现时各地方负责同志大半都有一种错误观念,以为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该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党员在质量上不发展,单是在数量上发展,不但无益,而且足以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因此,大半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这一错误观念乃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sup>⑤</sup>对比1923年6月中共三大的批评“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sup>⑥</sup>,很显然中共中央的内部建设原则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的探索,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因为大部分党员回国而终止了。

####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对于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十分重视,这体现在党、团重要文件中:“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以启发并形成他们的政治觉悟及批评能力;“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当中成了很紧急需要,这种教育的重要教材就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组织的本身就要是个训练的指导师,每种运动都要是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的课程”。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5、157页。

②学术界对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问题的关注较少,相关资料仅见《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3、7、10号,共计4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相关研究成果更为匮乏,主要有王永祥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史话》,北京:中国青年

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12页。王著有一节涉及这一内容,但未深入探讨;其他学者的研究则是一鳞半爪,且是对王著内容的转引。

③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08页。

④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827页。

⑤真实或全名已很难考证。

⑥熊锐:《马克思主义底几个重要点》,《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7号,1923年10月,第99页。

⑦《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16页。

⑧熊锐:《马克思主义底几个重要点》,《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7号,1923年10月,第102—103页。

⑨《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21页。

⑩《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1923年6月,第40页。

⑪真名或全名已很难考证。

⑫《共产社会中的道德问题》,《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训练部通信集》第10号,1924年12月20日,第159页。

⑬任卓宣:《人生观》,《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训练部通信集》第10号,1924年12月20日,第164—165页。

⑭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⑮《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19页。

⑯《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21页。

⑰《甚么是资本底意义?》,《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7号,第108—109页。

⑱任卓宣:《何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底正误》,《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7号,1923年10月,第115页。

⑲《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13页。

⑳傅钟:《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7号,1923年10月,第111—113页。

㉑任卓宣:《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7号,1923年10月,第113页。

㉒《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26页。

㉓《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1923年6月,第31页。

㉔《共产主义实现之条件的讨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训练部通信集》第10号,1924年12月20日,第161—162页。

㉕《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25页。

㉖《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26页。

㉗任卓宣:《辛亥革命底真相》,《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

第7号,1923年10月,第110页。

⑳《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15页。

㉑《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15页。

㉒《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26页。

㉓《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1923年6月,第34页。

㉔《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1923年6月,第37-38页。

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第265页。

㉖《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14页。

㉗《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2号,1923年5月,第29页。

㉘《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1923年6月,第36-37页。

㉙《巴小白组共产主义讨论会报告的节略》,《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1923年6月,第42页。

㉚《巴小白组共产主义讨论会报告的节略》,《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1923年6月,第42页。

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第255页。

㉜《巴小白组共产主义讨论会报告的节略》,《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1923年6月,第42页。

㉝参见《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第3号,1923年6月,第42-45页。

㉞陈三井:《旅欧教育运动:民初融合世界学术的理想》,台北:秀威咨询科技2013年版,第187-188页。

㉟“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编:《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台北:中华图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㊱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715页。

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页。

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第245页。

## The Study of Communism by the CPC's European Branc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munism Study Association's Correspondences

Jia Kai

**Abstract:**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party-building exercises has been significant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PC.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period of China, the CPC's European branch was a major asset in developing high level Marxism theory. The Study of Communism was the primary principle for to party management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hich was achieved mainly through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embers and intern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content of the Study of communism included: philosophical conundrums,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economics, frontier issues of fascism, scientific socialism, realistic problem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sm.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studying communism in the European branch was focused on three relationshi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ying communism and purifying m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group.

**Key words:** The European Branch; The Study of Communism; Correspondence of the Commun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Class